

战略思想新趋向

〔澳〕罗伯特·奥尼尔 等编

李植云 李鹏贵 等译

何祚康 潘嘉玢 等校

军事科学出版社

战略思想新趋向

〔澳〕罗伯特·奥尼尔等编著

李植云 李鹏贵 等译

何祚康 潘嘉玠 等校

军事科学出版社

NEW DIRECTIONS STRATEGIC THINKING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Boston Sydney

根据1981年伦敦版选译

战略思想新趋向

[澳]罗伯特·奥尼尔等编

李植云 李鹏贵等译

何祚康 潘嘉玢等校

*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21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21—016—2 / E · 016

全国统一书号：5291·086

定价：1.2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1981年所编《战略思想新趋向》(论文集)选译的。作者是来自美国、英国、挪威等国的战略问题研究专家和学者。书中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特别是苏美两国的战略思想,对它们的各种战略思想在80年代的新趋向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预测,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专家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本书对军事研究人员和军事爱好者均有参考价值。

我们出版此书,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作者在中所阐述的各种观点均持相同见解。至于书中有无偏颇之处,希读者注意分析鉴别。

军事科学出版社

前 言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研究70年代期间战略思想方面所出现的主要趋势，并就这些发展趋势在80年代可能导向何处提出看法。70年代，在战略相互作用的整个范围内，在诸如国际社会结构、超级大国理论、联盟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兵器技术、战术原则、军备控制以及军政关系等领域内，都出现了重大的发展。

随着苏联干涉阿富汗而产生的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上述事态发展的重要意义变得更引人注目了。尽管肯定地说世界已进入第二次冷战时期尚为时过早，但军事—战略因素在80年的国际关系中将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此时就过去十年中这个领域里的主要发展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并明确在今后多事的10年中将继续起作用的新趋向，是非常适时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提倡多思考探索如何对付或克服这些麻烦问题，以便有可能在适当的和平与和谐的环境中建立一个健康而有活力的世界秩序。

根据这样的目的本书编写的方法是先研究国际战略关系的主要方面，然后对具体国家范围内的和在战争方面的以及政治与军事相互作用领域中的事态发展进行分析。西奥多·罗普在第一章里撰写了一篇内容全面的文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略发展中出现的主要趋势进行了探讨。然后几位作者对指导超级大国的政策和国际体系的观点进行了探讨：

如赫德利·布尔教授论述了国际社会中医力的地位的变化情况；沃纳·希林教授和杰弗里·朱克斯分别探讨了美苏战略方针的发展；约翰·霍尔斯特先生对北约和华约集团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本书接着又研究了在不发生核战的条件下使用武力的具体方式：如肯尼斯·亨特准将对常规战争的讨论，罗曼·科尔克维茨对有限战争的分析。

计划和编纂本书花了将近两年时间。在编书初期，我得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国际关系、战略与防御研究中心和太平洋问题研究所的同事们的协助。撰稿人大多是一年前就请来撰写各自的论文的。1980年7月21日至24日，战略和防御研究中心在福特基金会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计划的财政支援下，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行了会议，会上向约三百名与会者提出了本书各章的初稿。按照会上及会后的讨论意见形成了目前本书的各个篇章。我们遵循的一项指导方针是，开会的目的在于帮助本书的形成而不是使本书仅仅是一份会议进程的记录。

从事这类研究的其他人可能把重点选在不同的题目上。如果要撰写一本篇幅更长的书的话，本可以把更多的题目包括进来并可以对现有题目作更广泛的探讨。但考虑到要使各阶层的读者，无论是战略方面的学者或实践家都能用得上，还是编一本象现在这样篇幅的精练的单卷本文选为好。

罗伯特·奥尼尔

1980年10月

于堪培拉

(李粒云 译)

目 录

前言

- 一、1945年以来的战略思想…………… (1)
- 二、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70年代的经验
 80年代的前景…………… (20)
- 三、70年代美国战略核理论：寻求充分对等的互
 相抵销的均势…………… (42)
- 四、1965—1990年的苏联战略…………… (78)
- 五、论有限战争——苏军观点…………… (98)
- 六、北约与华约关系中的威慑与稳定问题 …… (118)
- 七、70年代与80年代常规作战理论的发展…………… (138)
- 八、80年代的世界：战略上的问题及回答…………… (162)

附录

撰稿人简介

1945年以来的战略思想

〔美〕西奥多·罗普 著

李植云 译

对现代战略创始人的回顾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对于澳大利亚人竟然为他1780年6月1日生日举行200周年诞辰纪念会，可能只会稍稍感到有点受宠若惊。至于他的《战争论》居然会当作宝藏一样去检验那些“完整体系”和“包罗万象的学说”，他也可能不会感到吃惊，因为他自己从不曾想到要根据仔细整理的“材料”去建立体系和学说。克劳塞维茨生于1770至1789年的年代里，在这个年代里，最杰出的将才的同事们往往把他的箴言编成“难题解答”，但克劳塞维茨认为这些箴言在1790至1809年的危机时期已经被打破了。在1810至1829年的年代里重新建立战略理论的工作上他起了重要的作用。在1818至1827年期间，他就融会贯通传统经验、现实惨痛教训和预测未来方面下大功夫进行思索和著书立说。而他的神圣的、受到严格训练并具有传统思想的同行们则进而将其汇集成和平时期的法则、均势论及军事科学。

在克劳塞维茨于1831年11月16日逝世以来的岁月里，还

出现过两次军事理论上的危机。昆西·赖特所著《战争研究》（1964年）认为这两次危机与战争、和平每60年大循环一次有关。军事理论的危机阶段、修改范例或重创阶段和释疑阶段都与托马斯·S·库恩所著《科学革命的构想》（1964年）中所提出的各阶段相似。根据1792年、1854年和1914年开始的重大战事和危机发生的日期，不难构想出在一个文明世界之中，军事理论每20年变化一次的模式，这种文明自克劳塞维茨诞生以来一直在扩大和加强战争的规模和强度，同时在扩大和加强平时备战的规模和强度以及现代称之为战略研究的规模和强度，并使强化军事的过程实现工业化。假如西方战略思想方面的危机如期于1970—1999年来到的话，这反映了1950——1969年期间释疑专家们的无能为力，他们无法将他们在朝鲜战争之后制定的常规战程式同他们为了解决核战争和非常规战争的新难题而匆匆忙忙构思出来的程式联系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们仍在研究伟大的将才、伟大的战役、伟大的帝国，但是今天即令是他们，也要对他们集中论述的人物、制度及思想进行分析，以便为他们传统的研究课题增辉。

和平时期解决疑难问题的专家们首先用“最新胜利者”的语言来研究“新近的惨痛经验”。但随之而来的，更好地赢得上次战争的任何一种体系，仍然反映了有关社会、国家和军事实力的一整套相互联系的思想，或按照罗伯特·E·奥斯特古德和罗伯特·W·塔克的说法是反映了有关《力量、秩序和正义》（1964年）的思想。尽管成败得失对比常常可与战争赌博相比拟，但克劳塞维茨却把他们比作“贸易上的得失对比”或者说“更接近于政治，……是一种更大规模的

贸易上的得失相比”。然而，从军事上计算得失和从政治上计算得失以及从商业上计算得失，它们之间是无法比拟的。它们的结果是不同的；对于一方来说是有所得，对于另一方甚至可能是有所失。同军事战略家必须在“原始的暴烈性……偶然性和概然性的作用……（以及）纯粹的理性的政策”这个战争的“奇异的三位一体”中保持内部平衡一样，每一项目都反映出各自的“深深扎根于主题之中然而在其相互关系中又千变万化的法规”。（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第89页及149页^①）许多由此而引起的理论问题在即将发表的对爱德华·米德·厄尔的《现代战略创始人》一书（1943年）的阐述和评论中作了讨论。所以，总结一下战略思想在过去大循环的情况将会有助于说明“创始人”、“现代”、“战略”等字眼的含意在1980年看起来大大不同于1943年的那些事态发展。查尔斯·詹姆斯的增编新军语词典（1802年）并没有“战略”（由希腊字“将领”演变而来）的词条。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所指的“战略”是把计谋，即法国人的更多地依靠技巧而不依靠胆量去赢得胜利的“特殊才能”，同军事计算学，即“摆开军队阵势的艺术”结合起来。他们给指挥艺术增添了格言，这些格言是从历史、传记、兵书以及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致君主的谏书中总结出来的。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军事危机，与同时期的中国战国时期的危机一样，产生了游士说客以及论述战争很多方面问题的兵书。象色诺芬和孙子，

① 指克劳塞维茨所著《战争论》，英译本。中译文参照1978年军事科学院根据1957年柏林德文本的译本。但因版本差异和作者零星摘录，译文均按摘录的英译句翻译。下同——译注

这样古老的作家的计谋仍然能在腓特烈大帝的著作中找到，这反映了相类似的农业社会在技术、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历来由于对固定的城堡里不断投入季节性的劳力而变得更加严重。

开明的暴君的战略谋算实际上是以获利为目的的。“每个政府，”克劳塞维茨写道，“都拥有并管理着一座它总是力图扩大的巨大财产。他们进行战争的手段……是国库里的金钱和他们可以抓到的无业游民”。由于“每一方都能判断出对方在数量和时间方面的潜力”，因此象腓特烈这样“统率着有数量虽少但战斗力却高的部队”的伟大统帅，就能“把一个小国变成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克劳塞维茨对此没有规定任何固定不变的公式。但是，“一系列的命题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得到证明：防御是达到消极目的的较强的作战形式，进攻是达到积极目的的较弱的作战形式…以及战略性的成功可以追溯到某些转折点”等等，这意味着他的格言是支持那些取得“数量优势”的大多数的参谋计划系统的。“数量优势”是始于1792年、1854年和1914年的几次伟大战争中的“致胜的最普遍的因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961年英文版，第71、194、589页）

由于普鲁士总参谋部在1866年和1870年的成功，使得战后的战略计划工作几乎统统归那些训练和后勤专家们负责。鲁道夫·冯·凯默尔雷所著《十九世纪战略科学的发展》（1904年）公平地把功劳分给了腓特烈大帝、拿破仑，若米尼、克劳塞维茨和赫尔默特·冯·毛奇。但计划者的威望越高和越孤立，他们就越感到难以用“探索的……头脑”，采用“综合性的而不是特殊的方法”去认识“他们在通常情况下

会疏忽或只有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思索之后才会理解”的和平时期新因素。克劳塞维茨与他推崇仿效的孟德斯鸠一样，认为每个战略家的计谋“必然是受其自身地位的特性、时代精神……以及战争本身的性质所支配”。这些将会使他称之为精神、体力、数学、地理以及统计等战略因素的内部素质发生变化。（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第102、112、183、594页）

费迪南·福煦的《战争原理》（1903年）强调在战斗中要用“充分的准备……和因受到激励而倍增的数量”去粉碎“敌人的精神和物质力量”。若米尼根据几何学原理提出的“连续地把部队投入战区的关键地点和敌人的交通线上”的理论，要求尽快地在关键地点上部署尽可能多的兵力。在福煦称之为“仍在变得越来越具有民族性质……越来越威力巨大……越来越激烈”的战争中，“人的因素的优势”将使进攻得以进行下去。所以，法国人的报仇雪恨和德国人的英雄史诗都强调英勇的进攻。新达尔文主义者关于他们新帝国的解释给了所有西方的利己主义当头一棒。陆军的战略家们几乎没有探讨过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对十八世纪海军战略的箴言所作的新达尔文主义式的汇编。而且陆军和海军的战略战术都不曾正式受到过有独立的科学专家或外交政策专家的怀疑。在新帝国的官僚机构中“按部就班”的欧洲的总参谋部同吉利奥·杜黑称之为“活生生的、行动中的和运转着的国家”安全脱了节。

凡军人在平时都需在思想上常备不懈。他只有用杜黑所说的“回顾过去”、注重现实、想象未来的办法，才能从事自己的事业。但这样做可能会打乱已成为教条的、排斥一切怀疑及怀疑者的理论原则，所以和平时期的战略家能解

决老的难题，而持怀疑态度的人倒可能成为无人称颂的预言家。在1770—1789的20年间，吉贝伯爵曾于1772年问道，如果一个民族在欧洲兴起，它有一支全国动员的民兵，一项确定不移的扩张计划和……一个廉价的发动战争的系统（这个系统靠打胜仗而生存，它不会由于财政方面的考虑而放下武器），精神抖擞，资源充足，管理井然有序——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局势将会怎样呢？（吉贝，1803年）吉贝遇见腓特烈之后自己宣称放弃这种猜测，但这个猜测是如此准确，以致1830—1849年间的怀疑分子主要关心的事，就是征召来的拿破仑式“国家民兵”的效忠、后勤保障以及指挥问题。

1890—1909年期间，怀疑产生在技术、经济和政治方面。军人对于他们的速射武器的战术效果的怀疑已由波兰籍犹太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伊万·S·波劳克汇编成六册统计集，取名《从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看战争前途》（1898年）。新武器的出现会造成战术和战略的僵局、经济的崩溃和政治革命。战争在政治上已成为不可能了。波劳克的观点遭到了压制，但这些观点对第一届海牙会议的召开，以及对尔后的用统计方法研究现代战争曾有过某些影响。1911年，第一个国际组织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波恩建立。它打算“科学地，不带任何褒贬地”研究战争。当时的情况是，研究委员会的课题，……如论战争的经济和历史原因及后果、和平时期的军备、国际生活中的一元化影响等问题都没有被看作是战略学有关的一部分。

1914年灾难过后有66年了，历史学家仍对科学的战略批评家和在实力均势、军备控制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危机迹象

进行分类。F·W·兰彻斯特使用了一种数学公式来确定飞机在战争中的效能（1917年）。杜黑认为它们可以“分化瓦解各个国家”。J·F·C·富勒、B·H·利德尔·哈特等人想出了机械化地面部队实施闪击战的主意；另有一些人发明了新的潜艇作战和两栖作战战术。富勒认为，“进行工业化战争需要……（1）政治权威；（2）经济上的自给自足；（3）国家纪律……；（4）机械化武器及平时的准备工作。在“长期停战”期间，各大国都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战略。一旦战略重新成为军事和政治的共同事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就为调整战略作出了贡献，正是由于这种战略上的调整，西方国家和苏联才在1945年取得了比拿破仑更伟大的胜利。但是，对“大战”有这样的认识，即战争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业，不能交由将军们去处理。另一种思想则认为战争是太重要了，不能交由任何一群领袖人物或追随者去处理。而前一认识往往不能被后一认识所取代。

军事人才的兴起

自然科学家的成就和社会科学家所取得的一定成绩，使战略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方面和军事方面都受到了尊敬。研究战略问题的教授们同部长们和将军们一起进餐，而不是同马车夫和足球教练进餐。研究博弈论和行为特性的科学家们帮助伟大的将才们跟上了科学和技术的变革。1950—1969年的20年间产生了美国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团体（由肯尼斯·博尔丁、查尔斯·丁·希契、塞缪尔·P·亨廷顿、莫里斯·雅诺维茨、罗伯特·E·奥斯古德、托马斯·C·谢林等人

创建)，它协助制定了战后的美国战略。但这些创建人的个人影响不如几十年前的富勒和利德尔·哈特一辈人大。而研究战略问题的军事书中通常所讲授的社会科学，可能象福熙据以编写他的《战争原理》的战争历史一样，是教条式的。

他们的战略因素对比表内的“精神”一栏非常简单，常常同过分强调拿破仑的格言“精神与物质之比为三与一之比”一样。这些栏目对“指挥员的技能，士兵的经验和勇气，以及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出估价。克劳塞维茨知道，这些因素是部分独立的变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要低估它们之中的任何一项”。“这三个因素具有确实无误的效用”，其历史明证比比皆是。（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第183、186页）但是，美国的一些战略因素对比表却把国家的宗旨和国家的意志看作象国民生产总值一样，由战略家们为保卫特定的国家利益进行分配，而不将其反馈到国家意志或宗旨中去。美国的战略家们在1930—1949年的20年里同西方非凡的领袖们的“惨痛经历”，使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的研究冲突的人员难于看到方兴未艾的民主、民族和工业革命可能进一步改变“精神”力量的对比。于是，对那些据说曾驱使工业“穷国”投入战争的绥靖政策与遏止政策相结合的做法所表示的“泰勒式”的内疚情绪以及帝国主义者对其“半人半鬼的”老是“愤怒的人民”的犯罪感，会同时油然而生。

关于最近的伟大将才的材料，在数量上很多，在倾向性上也很明显。人们很快都知道了一切有关阿道夫·蒙蒂和艾克①的情况，而对斯大林的情况还不及对查理曼大帝和孙子

①指希特勒、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译注

了解得多。鉴于战略是集体制定的，历史学家至今对丘吉尔和劳合·乔治或诸如斯乌兹、劳伦斯、莫那希、托洛茨基等非专业的军事天才的个人作用，仍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因此把德国总参谋部在两次大战中的表现作为诺曼·F·迪克松的著作《论军事上无能的心理性质》(1973年)中所说的集体成果的例子来研究，还不是时候。对那些在60年代后期，在各种规模的冲突中，表现了在战略上无能的美 国 知识 分子、政治家和军人们，也不必用这种方式把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进行历史性的分析。

关于冲突规模的观点是从广岛、早期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经验中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在克劳塞维茨和其他战略家对有限战争、人民战争和小规模战争的论述中曾隐约地谈到过。关于这类战争英国战略家C·E·卡 尔 韦 尔于1869年写了一本陆军部手册。但1950—1969年的20年间，在军事科学中最早的重大变化是以多达六种的计划替代拿破仑式战争的战略计谋。这六种计谋是：核战、常规战、有限战争、游击战、准国家级战争和外交恫吓。如果在伯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一些建议对1919年的军事战略家来说 显 得 陌 生的话，那末大自“超级大国政治与世界秩序”，小至“准国家级暴力行动”这样一些题目，对20世纪30年代的军事科学家来说比对社会科学家来说还要显得陌生。被西方的无知的战略家称之为“非常规的”中国的会计制度，最终给多国联盟提供了几种新的战略计谋。在按民族来说是分裂的，而在战略上是统一的国际斗争舞台上到处都是这种联盟。在这张得失对比表上是收益，而在另一张上甚至可能是损失。投资和现金流动问题越来越取决于会计师“对自己的地位……时代精

神以及战争本身的性质”的判断。军事专家们据以实施战争的各项规则，已经都变得需要重写了。每个实践家不得不按照自己所属社会 and 行业要求使用的光谱辨明方向。

通常是，最大的战胜国确定战后战略辩论的调子。所以1950—1969年期间，辩论的题目及使用的语言都是由英美决定的，如同以前曾经是由法国和德国决定的一样。上个十年中惨痛的经验已经体现在这样一些政治术语之中，如：“衰退”、“孤立”、“绥靖”、“马奇诺防线”、“闪击战”、“珍珠港”、“大屠杀”、“广岛”、“冷战”等。英美两国几乎同时作出的关于军队复员和实施威慑的决定，这些决定成了第一批难题，确定了第一批核战争的得失对比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与常规战争和有限战争传统利弊的关系。英美军事科学的思想库——以兰德公司为这类组织机构的代表和以战略研究所作为研究工作国际化的标志——早已解决了曼哈顿计划和美国战略轰炸调查中提出的难题。至于它们以后遇到的理论危机是由于它们必须解决的新难题的复杂性，还是由于过多地使用统计分析，抑或由于成就过大过快的专门化和教条主义所致，则无法回答。但至1970年时，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一些有专门知识的军事人才的“分析迷宫”与战略的“生活现实”之间的鸿沟已经显得十分清楚了。（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183页）

对于英美在“胜利的顶点”上转向战略防御的做法，没有立即引起争论。防御的火力威力使波劳克得出结论认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看，战争已成为不可能。如今，用技术手段“从空中进行摧毁”，已变得极为便宜和容易了”。伯纳德·布罗迪在《绝对武器》（1946年）一书中对其深远的含义